

先秦散文綱要

譚家健 鄭君華



目 录

一、先秦散文概说	(1)
先秦散文繁荣的社会基础	(1)
先秦散文的发展阶段	(5)
先秦散文的历史特点	(9)
二、尚书	(14)
《尚书》的真伪与基本观念	(14)
“佶屈聱牙”——《尚书》文章的特点	(20)
关于《逸周书》	(26)
三、国语	(30)
《国语》成书于《左传》之前	(30)
《国语》的思想倾向	(33)
《国语》的文学价值	(36)
四、左传	(46)
《春秋》与《左传》的成书	(46)
《左传》的民本思想	(50)
众多的历史人物，复杂的战争场面	(55)
生动的情节，简洁的语言	(62)

五、论语	(68)
孔子及其仁学和教育思想.....	(68)
孔子的文艺观和美学观.....	(72)
《论语》的文学价值.....	(76)
六、老子	(84)
老子及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美学观.....	(84)
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	(89)
七、孟子	(95)
孟子及其民本思想.....	(95)
孟子的文艺观和美学观.....	(99)
“知言”、“好辩”的论说艺术.....	(103)
“能近取譬”的比喻和寓言.....	(108)
八、墨子	(114)
墨子及其十大主张.....	(114)
《墨子》的散文特色.....	(119)
九、庄子	(126)
庄子及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美学观.....	(126)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寓言故事.....	(133)
“汪洋自恣”、“仪态万方”的文章风格.....	(142)
《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145)
十、晏子春秋	(147)
《晏子春秋》的成书时代.....	(147)
《晏子春秋》的重民思想.....	(150)
关于晏婴形象的塑造.....	(155)
十一、战国策	(161)
《战国策》的成书时代和思想倾向.....	(161)

辩丽横肆的散文艺术·····	(166)
巧妙机智的寓言故事·····	(174)
十二、荀子 ·····	(182)
荀子及其唯物主义哲学观、文艺观·····	(182)
《成相》和《赋篇》·····	(187)
结构绵密、严谨浑厚的议论散文·····	(192)
十三、吕氏春秋 ·····	(199)
吕不韦其人和《吕氏春秋》其书·····	(199)
《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	(202)
杂取各家的寓言和历史故事·····	(207)
十四、韩非子 ·····	(214)
韩非及其法家政治观、文艺观·····	(214)
峭拔犀利、凌厉无前的政论散文·····	(219)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专辑·····	(225)
十五、先秦兵家、名家著作 ·····	(231)
《孙子兵法》·····	(231)
《尉繚子》、《六韬》、《司马法》·····	(237)
《尹文子》·····	(241)
《公孙龙子》·····	(245)
十六、其他先秦儒家著作 ·····	(249)
《礼记》·····	(249)
《考工记》·····	(256)
《易传》·····	(258)
十七、其他先秦法家著作 ·····	(267)
《管子》·····	(267)
《商君书》·····	(274)

《慎子》、《申子》·····	(280)
十八、其他先秦道家、杂家著作·····	(284)
《鶡冠子》·····	(284)
《文子》·····	(289)
《尸子》·····	(292)
附录：先秦散文简明阅读书目·····	(296)
后记·····	(304)

一 先秦散文概说

先秦散文繁荣的社会基础

先秦散文是中国古典散文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丰富多采的散文著作和风格各异的散文名家，为中国文学史掀开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散文的发展有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深刻的社会基础。其代表作品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发生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促进散文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所在。

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战国末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的时代。在政治上，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奴隶和平民的起义暴动史不绝书，各国诸侯和贵族集团的争斗愈演愈烈，弑君亡国屡见不鲜；大国争霸，小国结盟，兼并不已，干戈不息；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对各国的控制和尊严，统治地位、力量、权威急速下降，以致实际上沦为附庸。而诸侯和卿大夫的实力不断膨胀。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事实上主宰着这个时代。春秋后期，鲁国三分公室，郑人

“铸刑书”，晋国“铸刑鼎”，就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征兆。战国初年，田氏代齐，韩、魏、赵三家分晋，标志着旧的依靠宗法制维系的奴隶制政权已走到它的终点，新的地主政权已经在我国大地上正式确立。

在经济上，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动。铁制农具和牛耕已相当普遍，农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自由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队伍一天天壮大。奴隶主无法继续迫使奴隶和农民集中到“公田”去集体劳动，导致井田制逐渐瓦解。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奴隶制农业生产已无法维持。于是从春秋中叶开始，有些国家从改革分配关系入手，逐渐对生产关系进行一些调整：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哀公十二年，鲁国季孙氏“用田赋”。进入战国以后，许多国家竞相实行“变法”。魏国任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法”；楚国用吴起，赵国用公仲连，韩国用申不害，秦国用商鞅，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商鞅的两次变法比较彻底，明文规定“废井田，开阡陌”，允许买卖土地，奖励耕战。这对于解放生产力，巩固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是，到了战国中后期，城市日益扩大，有的相当繁荣，商品交换活跃起来，交通逐渐发达，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上述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加深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复杂斗争，促使各阶级、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时情况，交流思想观点，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这样，旧有的《诗经》式的民歌自然不足以表现这样复杂多变的新内容，早期

《尚书》式的古奥文体也不能够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于是，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便应运而生，成为记录和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工具。

春秋战国的阶级变动产生了“士”的阶层，为散文的创作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条件。奴隶制的崩溃，使“世卿世禄”制度遭到了冲击，各国贵族出现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地位下降，沦落为“士”。同时，由于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大量奴隶变成了自由的平民，他们当中有一批杰出人才破土而出，表现出高度的聪明智慧，构成“士”的主流。这些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学识与特长，他们积极参加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出谋献策，有的还著书立说，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春秋中期开始，一些开明的君主就大力搜罗各种人才。齐桓公重用管仲、宁戚、隰朋、鲍叔牙；秦穆公用由余、百里奚；楚庄王用孙叔敖；吴王阖庐用伍子胥、孙武；越王勾践用范蠡、文种、计然：这是他们能够称霸诸侯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战国，更进而出现养“士”之风。齐宣王在齐都临淄的稷下，建立高门大屋，设为学宫，招待天下文学之士，让他们“不治而议论”，专门从事学术理论工作。齐国的孟尝君“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以及后来的秦相吕不韦，养士都在三千以上。各国统治者对“士”非常礼重。魏文侯师事子夏；梁惠王与淳于髡倾谈，“三日三夜无倦”；学者邹衍到赵国，平原君“侧行敝席”；到燕国，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这就使得“士”的队伍迅速扩充，为思想文化的繁荣造就了宏大的作者和读者队伍。

在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解放的时代，学术的桎梏被打

破，风气比较自由。从春秋末年起，文化逐渐下移，教育慢慢向平民开放。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于是形成儒家。进入战国以后，讲学从师和著述之风更盛，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驺衍、慎到、公孙龙等都是既讲学，又著书。出现了九流十家，即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家、小说家，另有兵家不在其内。每一家都有大批门人弟子，并且内部又分成不同派别和集团。如儒分为八，墨析为三，法家则融合法、术、势三派为一。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各种哲学、政治和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呈现出所谓“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互相驳难，展开辩论，自由抒发己见，成为我国学术史上最令后人羡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各种学术派别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记录和发表出来，便成为文章著作。为了扩大影响，增强效果，使广大群众和帝王贵族喜闻乐见，他们非常讲究表达的方式方法，注意结构修辞，力求语言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甚至大量采用历史传说、寓言故事、民歌谚语以及比喻、夸张等手段，这样，一些哲学和史学著作，便同时具备一定的文学性质，也就成为我们所说的“散文”了。

从文化史上看，先秦散文的繁荣还有着文化艺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主观条件。在诗歌方面，伟大的诗歌巨著《诗经》经过数百年的收集流传，至迟到春秋中叶已编纂成书。战国时代又产生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这些作品中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优美的表现艺术、高超的语言技巧，与散文相濡浸染，互为促进，成为最密切的姊妹艺术。其他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民间艺术等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学，史官的置设由来已久，

史籍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春秋以后，各种史书资料明显增加。楚国的左史倚相曾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见《左传》）。楚国另一位学者申叔时推荐给太子读的史书有九大类（见《国语·楚语》）。墨子说他曾看到“百国春秋”，其中包括《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读过《夏书》、《商书》、《周书》。孟子曾见过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梲杌》等等。这都为历史散文在春秋战国的全面繁荣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

先秦散文的发展阶段

先秦散文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繁盛的过程。我国远古时代出土的各文化阶段的遗物中，有的陶器上已描绘出一些类似文字的图案。古代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开始有意义的文化创造，旧说伏羲氏曾画八卦，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始创文字。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尚不可确考，但是可以肯定，殷商后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即甲骨文和金文（铜器铭文），散文便从此孕育萌芽了。从殷商到战国末年，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殷商西周，属于先秦散文的初级阶段。作品主要有甲骨卜辞，殷周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辞》、《爻辞》，和《尚书》中的《商书》、《周书》等。

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片断。原是商代帝王占卜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内容多数是预测祸福，判断吉凶之类，也有少数其他记事文字。简则几个字，繁则百余字。现在能识的文字还不到一半，许多文句不能理解，但也

有一些比较完整可读的片断。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是卜问降雨将来自何方的，文字清晰，句意明显，叙述完整周到，可以说是记叙散文的胚芽。

殷周铜器铭文是殷商和西周帝王、贵族镂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殷商铭文比较简短，最多四、五十字。周代铭文有所扩展，最长的近五百字。主要记载贵族的功绩、讼断、赏赐等。风格多庄重典正、缺乏文采。大部分是散体，少数有韵。文字难以识别，又多缺蚀，加上当时的贵族生活及名物制度不易了解，因此与甲骨卜辞同样难懂。

现存《易经》中的《卦辞》、《爻辞》是一种专为卜筮所用的书籍，其中有商末周初的文字。有些地方记载了殷商时代的战争、祭祀、风俗等，表达了某种生活的经验和哲理。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并有某些生动的描写和一定的形象性。

现存《商书》五篇，是殷商史实的记录，比起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篇制更为完整，已不是分散零碎的片断，而是初具规模的文章。其中有些语言可以看出一定的技巧，使人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和口气。《周书》原有数十篇，后来散佚，现存十九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少数是东周所补。《周书》比《商书》篇制更为完整，记事更加复杂，结构大都比较严谨，有些篇章写得层次清楚，有条不紊，显示出散文的进步。不过，无论《商书》或《周书》，大都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与春秋以后的散文差别甚大。

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之际。这时出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春秋》和《国语》、《左传》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春秋》是

鲁史大事记，据说是孔子据鲁国的史料编纂而成的，系年纪事，简练精严。《国语》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其最初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与《国语》平行而稍后的《左传》，是仿照《春秋》记事次序，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材料而写成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字，内容比《国语》又更广阔丰富，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表达和结构布局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标志着历史散文已经臻于成熟。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诸子散文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基本上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形式，文字比较简练质朴，篇章短小，长的几百字，短的只有几个字。内容往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策略性，但是论述往往没有充分展开，还带有某些片断性，说明这时的哲理散文还处在初创阶段。

第三阶段是战国中期，以《孟子》、《墨子》、《庄子》为代表，以论辩体说理文为主要形式，在体制上已具有一定规模，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其中《孟子》是孟子本人与弟子共同编定的，全书以语录体、对话体为主，有的篇章已逐渐向论说文过渡。墨子其人在孟子之前，其书则成于《孟子》之后。书中一部分是有中心有标题的专题论文，但并非墨子本人所作，而是由他的三四传弟子将他的语录拼凑组合而成的。庄子其人大约与孟子同时或略后，其书中的内篇，可能出于他本人之手，外篇为其门人所作，杂篇则出于道家后学。这样，全书的编定当不会

早于《墨子》。其文体比较复杂，大多数仍有对话和片断的痕迹，杂篇中的体制似乎更为完整。其他各家著作，如《商君书》、《公孙龙子》、《尹文子》、《申子》、《慎子》以及《竹书纪年》等，大体上也产生于这个时期。

第四阶段是战国晚期。这时，全国统一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百家争鸣的形势已经发展到总结融合阶段，《荀子》、《韩非子》正是其代表。他们都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题性的探讨。文章结构严密，讲求逻辑和修辞，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高度成就。由吕不韦集合门客集体编著的巨著——《吕氏春秋》，是企图熔铸各家于一炉的创举。其内容博大，体制宏伟，系统周详，把历史和哲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有叙有议，有纲有目，其风格和别家又大不相同。它和《荀子》、《韩非子》几乎同时出现，都是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制造舆论，不过他们的方案各自不同而已。

此外，有一些散文著作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编定年代尚难确定。如《管子》，其中可能有春秋末年的资料，又有战国时期的文章，还有秦汉时人所增益。《晏子春秋》的编订大约在战国末期，其中的素材有的来自春秋末年和战国中前期的史书或私人著作，有的来自民间，是一部关于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战国策》的成书约在战国末年，而其中作为单篇文章的记录、写作，有部分可能是在战国中期，出于苏秦张仪等人的门人宾客或纵横学派之手。《礼记》是儒家的论文集，其中有一部分是战国中后期儒家学派的手笔，少部分是汉人所作。这些书的出现，都是和战国末期的社会需要分不开的，因而不妨把它们视为先秦散文第四阶段成果之一部分。

还有一些先秦著作的真伪问题历来存在争议。其中有一类已

被大多数学者确认是后人伪托，如《伪古文尚书》、《孟子外书》、《邓析子》、《鬼谷子》、《关尹子》、《子华子》等等，基本上可以不放在先秦散文之列；另一类是尚未有定论的，如《列子》、《周礼》、《孔子家语》等等，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只好暂时存而不论；第三类是通过新近考古发现和研究者的考辨，原来曾被怀疑而现在已证明不伪的著作，如《尉繚子》、《六韬》、《文子》以及《鶡冠子》、《尹文子》等等，我们吸收了学术界的有关成果，把它们视为战国时期的作品。除上述三类之外，还有新发现的一批古佚书，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十六经》、《相马经》以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等，都已被确认为战国时期著作，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研究先秦散文史所不可忽视的。

总的看来，先秦散文著作大都不是一人一时所成，而是经过许多人的记录或加工、写作或编订而成书的，所用时间长短不一；而且，几乎都存在程度不同真伪混杂的问题。以上分期只是大致而言。至于每部著作的具体时代，本书各章将进一步介绍。

先秦散文的历史特点

先秦散文在我国散文史上独树一帜，是源头，又是高峰，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影响极其深远。

概括地说，先秦散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散文，通称诸子散文，又叫哲理散文；一类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历史散文。它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广泛地表现在内容、体裁、风格、结构、语言艺术等几方面。

先秦散文的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文体上看，众体皆备，百花齐放。纷芸变化的历史活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蜂起并作的各个学派，使散文以不同的文笔体裁显现出来。就历史散文而言，《国语》、《战国策》为国别体；《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为编年体。《尚书》、《国语》和《战国策》以记言体为主；《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以叙事为主。有的记言体著作也有叙事篇章，同时叙事体著作里也有大段的记言内容，不能截然分割。还有少数篇章实际上是后世纪传体的先驱。就诸子散文而言，《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孙子兵法》是散韵结合的格言体，《墨子》、《孟子》、《庄子》主要为对话式的论辩体，《荀子》、《韩非子》多为专题论文。篇幅有长有短，有整有零。诸子散文大多为说理文，但也不尽然，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就主要是记叙文。由于成书历史的长期和复杂性，有的诸子书中有若干不同的文体。如《墨子》、《韩非子》、《管子》既有论辩体说理文，又有语录体，解经体。除以散体为主外，有的著作还有少数韵文，如荀子的《赋篇》和《成相篇》，韩非的《主道》和《扬权》。至于散文中夹杂若干韵语更属常见。

第二，从内容上看，文、史、哲不分，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不少作品，既是历史学、哲学，又具有文学色彩。由于作者的思想、气质、政治流派不同，他们的文章便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个性。如《论语》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灵活善譬，多辞好辩；《庄子》想象丰富，恣肆诡异；《荀子》结构谨严，论断缜密；《韩非子》辞锋峻削，说理透辟，等等。同时，在许多哲理著作中，往往又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片断，包括一些珍贵的上古史资料。而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大量反映出当时的政

治观念和哲学思想。诸子著作中，除了哲学和政治观点外，都还广泛涉及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军事学、自然科学等等许多方面。其思想既有进步的积极因素，又难免有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糟粕。文学价值也很不一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不一样。其中有的艺术性相当高，有的只能说具备一定文学性，有些属于专门的科学文字，如《墨经》六篇、《备城门》以下十三篇，以及《黄帝内经》之类，一般就不把它们当作文学散文看待了。

第三，先秦散文都是密切为现实服务的产物，不存在为艺术而写作的文章。许多著作目的性非常明确，作家首先想到的是实用价值，而不是美学欣赏。历史散文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记载和总结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并指导当时的政治斗争。诸子散文大抵是政治活动和思想斗争的产物，其目的或在于“干世主”，以取卿相之位，或在于阐明政治学术观点，以流传后世，或在于批判指摘社会弊病，以发泄不满。有少数作品似乎与现实斗争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并不是纯粹欣赏性的文学作品。当时所谓“文”或“文学”，都不是自觉的艺术创作，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诗经》、《楚辞》是有所不同的，跟魏晋以后的“文学”、“文章”概念也有区别。总的看来是学术性大于文艺性。因而对于什么是散文，在先秦要比后世适当放宽一些。这时散文的审美价值一般地说还不曾得到作者充分的重视，纯粹以抒情为目的的散文和主要表现山水田园自然美的散文，在先秦都没有出现。虽然某些著作也曾有少量虚构的情节片断，如历史散文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等等，但就全书而言，仍然重在实录和析理，与虚构成分较多以神话传说为主的《山海经》、《穆天子

传》不同。因而，这两本书通常不算在先秦散文之列。

先秦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两千多年来，先秦散文著作中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一直滋润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中有的思想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有的构成我们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在文学上，先秦散文的各种表现手段，一直被视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楷模。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章的体制和写法而言，先秦散文确实在大部分领域开后世散文之先河，许多文体都可以从先秦找到源头。

后世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标举和借鉴先秦散文。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设有《史传》《诸子》等专章，对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文学价值作了精辟的论述。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有《言语》《叙事》等篇，事实上总结了历史散文的写作经验。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都极力推崇先秦散文。韩愈总结自己学习写作的经验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穷究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柳宗元自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北宋古文运动的健将们无不提倡继承先秦散文